

# 澳華新文苑

第1240期(A)



## 倫敦馬車闖入午夜香港

——吳正、狄更斯双城對照

狄更斯的《雙城記》，撕破了倫敦的濃霧。吳正的《新雙城記》，撫摸了流亡者的孤魂。狄更斯揭示了歷史暴力中的倫理困境；吳正勾勒了革命、個體救贖與文學見證的路徑。



三十多年前，上海，吳正詩歌沙龍，後排右2，吳正；右3，余秋雨；右4，奚美娟；右5，白樺；前排右1，沙葉新；前排左2，淳子。

1993年間。上海外灘。一間巴洛克風的屋子，吳正，余秋雨，沙葉新，白樺，李傳勇，還有我，還有其他一些人，濟濟一桌，慨當以歌。那時，吳正的頭銜是詩人。屋子裡永遠堆著層層疊疊的華服，恍惚才卸妝的歌劇後台。後來，人生各自出走，各自拐彎。偶爾在江湖上聽聞吳正，才知已然著作等身。

隔了三十多年，居然在澳大利亞，參加吳正作品研討會。似乎我，或吳正，譬如狄更斯《雙城記》中德法奇太太的線團，命數早就纏繞在那條圍巾裡了。

### 一、正義的倫理迷宮

《雙城記》的歷史坐標鎖定法國大革命。狄更斯揭示暴力革命的非理性本質。德法奇太太的復仇執念與卡頓的救贖犧牲，構成對革命倫理的反思。吳正的歷史視野則覆蓋20世紀中國百年滄桑，從抗日烽火到香港回歸，其作品中的歷史創傷始終與個人命運交織。二者在歷史書寫上存在隱秘共鳴。狄更斯筆下，倫敦霧靄與巴黎斷頭台，一個關於“正義如何可能”的永恆詰問。當革命以自由之名吞噬個體，當舊制度的壓迫被新暴政取代，倫理的邊界在血與火中變得模糊。律師卡頓走上斷頭台的腳步，踏出的不僅是個人道德的完成，更是對“以暴易暴”歷史邏輯的深沉質詢——正義是否已在血腥中自我瓦解？

二百年後，吳正的筆觸劃過香江與黃浦江——香港回歸的歷史時刻，在文學鏡像中映照出另一重倫理困境：殖民的烙印，民族的情緒，暴力內化的日常恐懼，“看不見的名單”取代了斷頭台的劍刀，人們成為自己的獄卒與囚徒；傅雷、顧聖嬰、聞捷、言慧珠、老捨……這些名字、許多名字在午夜沉入暗河，他們的死亡不是卡頓式的救贖完成，而是“以革命的名義”的暴力延續。

狄更斯通過描寫革命恐怖來警示英國社會，吳正則在歷史創傷與文化撕裂中，尋找“回家”的路徑。那些選擇留下、離開或歸來的人們，各自帶著不同的“名單”——家族記憶，政治傷痕，文化鄉愁。

從巴黎街壘到香港街頭，從《雙城記》到《新雙城記》，核心問題始終未變：當大歷史碾壓而過，個體如何保持尊嚴？當集體敘事要求犧牲，個人良知何以自處？

狄更斯給出的答案是“用愛和仁慈來重建社會”；巴黎雨果的《悲慘世界》，與狄更斯同類，通過國家機器之警察沙威（Javert）自投塞納河，給出了道德救贖的出路，溫情的結局一如雨果故居的粉色窗簾；吳正的《新雙城記》則記錄了知識分子在恐懼中的遷徙與徘徊；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沒有從“傷痕記憶”升華至巴金的“民族共同的精神清算”。

### 二、革命范式的傳承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巴黎尋找雨果，也尋找伏爾泰。伏爾泰的物理空間已被拆除，只剩下一塊十分容易錯過的銘牌。伏爾泰與法國大革命權力的關係，是一場未完成的對話。法國革命始於伏爾泰式的批判，卻終於盧梭式（或馬基雅維利式）的、強調統一意志和生存至上的權力政治。它證明了一個殘酷的歷史邏輯：用於摧毀舊權力的思想武

器，未必能有效制約新生的權力本身。批判的理性，不等於治理的理性；否定特權的哲學，不等於保障自由的制度。伏爾泰的遺產提醒我們：對任何權力——無論它冠以國王、人民還是革命之名——保持清醒的理性批判和捍衛個體自由的警惕，是永恆的課題。法國大革命在將他的遺骨奉入神殿的同時，也在某些時刻背離了他的核心精神，這恰恰說明了權力運作的複雜性與知識分子在現實政治中的曲折命運。

法國大革命提供了最初的革命腳本和話語體系：人民主權、革命權利、共和國、恐怖統治、普世價值等。其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成為了後世所有激進革命的源泉。

俄國革命（尤其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十月革命）自視為法國大革命的繼承者和超越者。它認為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俄國要完成更徹底的“社會革命”，即無產階級專政。列寧等人經常引用和類比法國大革命。兩者都經歷了從溫和開端（法國立憲議會/俄國二月革命）到激進高潮（雅各賓恐怖/布爾什維克專政）的過程。兩者都公開將“恐怖”視為在內外危機中保衛革命的必要手段。法國的“恐怖統治”與俄國的“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紅色恐怖形成了直接的歷史呼應。

俄國革命後的蘇維埃國家，其對社會經濟的控制力、意識形態的排他性以及對暴力工具的壟斷，都遠遠超過了雅各賓法國，預示了20世紀極權主義的形態。

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幾乎都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思想餘蔭下成長和思考的。

亞歷山大·赫爾岑，早期社會主義者，深受法國革命思想影響，目睹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後，對西歐道路產生深刻懷疑，轉而寄望於俄國的農村公社，成為“民粹主義”之父。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輕時是革命小組成員，被捕並經歷假死刑。後期作品（如《群魔》）是對激進革命思想及其可能導致的道德虛無主義和恐怖統治的最深刻的文學預言和批判。

列寧本身就是頂級知識分子和理論家。他將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實踐結合，直接策劃和領導了十月革命。

馬克西姆·高爾基，革命前是反叛的文學巨匠，革命初期對布爾什維克的暴力持激烈批評態度，後與列寧政權和解，成為蘇維埃文化界名義上的領袖，但其內心始終充滿矛盾。

無數“舊知識分子”：如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以及科學家、哲學家們，在革命後經歷了被驅逐、沉默、迫害或被迫妥協的悲慘命運。

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屬同一譜系，所謂馬恩列斯毛。從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到新政權，到香港回歸的“一國兩制”，歷史似乎企圖在螺旋上升中尋找更文明的解決方案。

魯迅的解藥是人血饅頭，吳正們呢？《新雙城記》裡的主人公，始終在悠長寂寥的弄堂裡敲著厚厚的牆。

### 三、流亡者的書寫

今天，悉尼最高氣溫39度。兩部《雙城記》，並置在書桌上，還多了一本《古拉格群島》。

狄更斯通過卡頓的犧牲提出道德救贖的可能，最終指向人性的尊嚴。《悲慘世界》被稱頌為人性的宣言、道德的燈塔；而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恰恰在於個人在政治權利拉扯中的無處安放。吳正的敘事中，離散者或者流亡者通過回憶重新建構信仰——走筆至此，我赫然聽見納博科夫的一聲歎息。

他道：當故土消失，如何通過文學，重構“彼岸”？

流亡海外的俄羅斯作家，構成了世界文學史上一首獨特而悲壯史詩。



九十年代，淳子在吳正的地盤，聽海關鐘聲，看江面風帆，吃龍蝦泡飯……

## 國際詩人筆會在悉尼歌劇院舉行有賀

2025年12月7日，國際詩人筆會在悉尼歌劇院舉行2025年會，會議耗時近5個鐘頭，包含多項內容：第八屆博覽國際詩歌節開幕式及頒獎典禮（傑出成就獎、年度詩人獎、年度詩集獎），首屆國際詩人筆會金筆獎、第七屆黃亞洲行吟詩歌獎國際大賽頒獎典禮（金、銀、銅獎和優秀獎）、國際詩人筆會執委會2025年度工作報告、2025年度金袋鼠藝術獎等。來自世界多個國家和澳洲本土的近百位詩人出席了今天的年會。

### 王香谷

多元文化越千里，四海騷人聚悉尼。所願和平循禮教，自由正義出仁慈。一城春色藍楹秀，滿座詩情芳草知。擊節相逢終惜別，他年緣會可心期。

### 恆心馬

梨城歌院墨痕香，騷客歡欣匯此堂。贊語潮隨雲浪湧，詩心帆逐海天長。千秋氣象歸吟卷，萬國煙霞譜錦章。跨越天涯情義在，風襟自可駐晴光。

### 尹峰

星霜數載鑄詩盟，五色雲霞接鶴程。幽谷生煙皆化玉，文壇振鐸自飛聲。簫傳海氣襟期遠，韻洗天光筆陣橫。今日吟旌凌碧浪，萬邦風雅匯蓬瀛。

### 行香子·李振國

鵬翼裁雲，碧浪浮春。瞰南溟萬象涵辰。潮鳴貝闕，虹曳青雯。賞水中帆，波中影，墨中痕。今朝把袂，清歌相契，對瓊筵珠玉紛綸。杯邀四海，筆賦星文。便風同駕，山同賦，醉同巡。

### 行香子·丘偉芬

鵬翼裁春，蒼背馱雲。喚南溟萬象更新。潮生貝闕，霞染游輪。匯詩中帆，波中月，硯中痕。星槎八度，清樽再契，恰喜逢珠履綸巾。墨融四海，筆綴瓊文。正風同驛，舟同濟，夢同巡。

伊凡·布寧，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羅斯作家（1933年），他在流亡中深刻描寫了舊世界的崩潰和流亡者的鄉愁與精神困境。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俄國革命後流亡歐洲，又為躲避納粹移民美國的“雙重流亡者”。他失去了母語環境（俄語）和故國（俄國），被迫在異質文化中用非母語（英語）進行最高級別的文學創作。這種經歷的核心困境是：身份的懸置。《洛麗塔》成為流亡困境的文學轉喻。

洛麗塔最終逃離、衰老、死去，宣告了亨伯特幻想的徹底破產。這象徵了流亡者與故土或理想家園之間聯繫的永恆斷裂。

小說中的亨伯特，是一個無法在現實中找到歸屬的“永恆流亡者”的悲劇。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他的作品如《古拉格群島》、《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等，系統而深刻地揭露了蘇聯勞改營的恐怖，獲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他被驅逐出境後，在美國居住多年，蘇聯解體後返回俄羅斯。他的歸去來兮，頗似吳正的人設。

約瑟夫·布羅茨基，1972年被蘇聯驅逐出境。成為美國桂冠詩人。198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的

詩歌和散文充滿了對帝國、語言、流亡和時間的深刻思考。

幾代流亡作家，是“隨身攜帶的俄羅斯”。

吳正的作品，是俄羅斯流亡文學的中文寫作。他和他們用人生和筆墨，對歷史，對知識分子的良知，遞交了一封封長信，綿綿不斷，然而答案，亦是遙遙無期。

生命已被多重轉譯，面目不清；交界處的靈魂，何去何從？

革命的“悖論”與極權的“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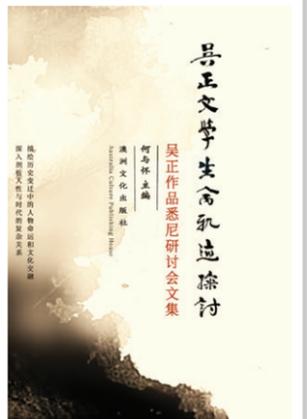
從1789年延伸到至今，斷頭台的陰影從未真正消散——它只是變換形態，時而顯形為革命暴力，時而隱匿為制度性恐懼。而文學的價值，恰在於為每一個時代的“卡頓”與“流亡者”、每一個“吳正”留存證詞。

當個體被拋入體系的“群島”，選擇的空間被壓縮到零，記錄和言說本身，便成了最卑微也最具良知的反抗。

歷史的傷口不會因政權更迭自動愈合，真正的回歸需要比政治儀式更漫長的倫理，而雙城敘事，始終是有價值的對照記。

（2025年12月6日於悉尼）

淳子



《吳正作品悉尼研討會文集》封面



吳正先生作品研討會海報